

吳佩孚新傳

前言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生於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卒於中華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十二月四日，年六十五歲。

吳佩孚考中滿清秀才後，投筆從軍，由「護勇」幹起。日俄戰爭時期，他奉命赴東北做偵探，被俄軍逮捕，判處死刑，於押解中途，設計逃脫。卅三歲調回保定後，從營附幹起，升到北洋第三師師長。由於他長於練兵，注重軍紀，勇敢善戰；於是，以第三師節制之師為基礎，開創事業。一戰定湘南，二戰勝皖段，三戰收湖北，四戰勝奉張，而有「常勝將軍」的雅號。由於他能觀察時局的關鍵，往往一紙通電，痛陳弊失，言人所不敢言，動天下視聽；於是他在政治上的聲望之隆，遠超過其他統兵大員，甚至遠超過他的直屬長官曹錕。由於他個性正直剛強，不貪私財，甚至公開宣佈以「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的「四不」自律；因此，他和當時一般軍閥政客比較，大有鶴立雞羣之勢，而為中外人士所讚譽。

當他以直魯豫巡閱使地位開府洛陽，做五十歲生日時，曾有「聖人」雅號的康有爲，居然送他壽聯爲：

「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

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由此可知，當年吳玉帥的威望和身價是如何的如日中天了。

可是，他却迷信武力萬能，躬蹈袁世凱、段祺瑞企圖以武力控制一切的覆轍；無從接受民主的洗禮，主義的薰陶，以致一敗於馮玉祥的陣前倒戈，再敗於北伐軍的革命義師，當其危難之時，天下之大，幾乎無其容身之地，甚至想到出家爲僧。幸虧駐守四川萬縣的楊森，危難見真情的對他加以援手，歡迎他去四川暫住，從此不問世事。民國廿一年，他才回到北平安居。

本來已經處於平淡生活的吳佩孚，却因爲抗日戰爭爆發，而又興起浪潮。他的輝煌往事和過人聲望，成爲日軍和奸僞們爭相誘致的對象，都希望由他東山再起，與重慶中央政府爲敵。

他雖然已失意多年，但處此國族緊要關頭，却能堅持大節，深明大義，既拒絕汪精衛的「合作」請求，復迴避日軍威逼利誘的「勸駕」。最後，竟因此被日敵暗害成仁。

他在北洋政府本已經官拜陸軍上將、孚威將軍。成仁後，國民政府曾予明令褒揚，並追贈陸軍一級上將。生死哀榮，感動中外，非常難得。

六十五年的歲月，他曾爲軍閥，叱咤風雲；曾爲國民革命的第一個要打倒的敵人，窮無所歸；但最後却成爲善守道義，堅持大節的君子、烈士，成爲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激勸頑愚的楷模人物。此其間，固然有他獨特的風格，卓異的操持；而其平生經歷，大開大合，也有很多忠勇偉壯、驚險譎奇的事蹟，而且也關係到大局的轉變與興衰隆替之道。

因此，筆者用精簡的筆調，淺顯的文字，敘述吳佩孚的生平，以供研究近代史學者的參考，並請指教。

敬慕關岳 秀才從軍

吳佩孚的父親吳可成，開雜貨店維持生活，母親張氏，是一位克勤克儉的賢妻良母；長兄道孚，早夭；弟弟文孚。吳佩孚兒時雖然頑皮，但却能自愛自重。十三歲的時候，因爲要賺錢貼補家用，參加水師營當學兵，每月二兩四錢銀子，一文不花，全數充作家用。十四歲父親死了，母親替他找到一位名師李丕森先生，一面當學兵，一面用功讀書。緊張嚴肅，刻苦奮鬥，沒有任何嗜好。

課餘公餘之暇，他喜歡看小說，最愛看「三國演義」和「精忠岳傳」；又因爲關心練兵，看到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紀效新書」。因此，他從小就敬慕關岳，私淑戚繼光，奠定其忠君愛國的思想。

他廿一歲那一年，日本軍艦一艘突然無故的開砲示威，打中蓬萊閣，把懸掛閣上「海不揚波」匾額的

「不」字打碎，變成「海揚波」。吳佩孚看在眼里裏，怒生心頭，從此有了從軍報國的志願。曾經題詩一首，發舒他的此一情懷，詩云：

「黃種應享黃種權，華人該種華人田。

熱血男兒拼一死，不許強寇成霸業。」

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山東登州府舉行院試，吳佩孚第一次應試，居然高中第三名秀才。於是，他成爲縣學的學生，不但可以當塾師，賺錢養家，而且可以繼續上進，前途無量。

好景不常，吳佩孚冬烘頭腦，一時意氣激憤，闖了大禍。他一向主張男女之間應該嚴密關防，可是，當地的電報局長過壽宴客，居然有男女合演的堂會。他決心以端正風俗爲己任，集合一些同科新秀才和好事的青年，打進電報局長公館，對着包括縣長在座的佳賓，公然指斥他們「違犯禁律，助長淫風」；並且揮棒動武，擾散了堂會，趕走了賓客。縣太爺受此閒氣，惱羞成怒，第二天就革了吳佩孚的秀才，派人抓他治罪。他成了「通緝犯」了，不得不潛離家鄉，去北平找他的父執輩隆慶棧的孫掌櫃。

孫掌櫃雖然開客棧，但也不寬裕，除了供他住宿外，不管吃飯。吳佩孚身無分文，祇好靠賣春聯，搞算命卜卦過活，賣春聯有季節性，算命卜卦生意清淡，眼看「吳鐵嘴」要挨餓了，但却絕處逢生的遇到他的堂兄吳亮孚，勸他到天津去投軍，於是，透過亮孚把兄弟的關係，他被天津武衛軍收錄爲一名「護勇」。

——衛兵。

天津武衛左軍，是以淮軍爲基本的部隊，統領是直隸提督聶士成。庚子拳匪之亂，聶士成在八國聯軍和拳匪夾擊之下，壯烈殉國；吳佩孚參加戰役，大受刺激，於是，脫離武衛左軍，跑到唐山，考進了開平武備學堂。

等到袁世凱小站練兵，將開平武備學堂遷往保定，改爲「北洋武備學堂」；規定尚在肄業的學生，可以調赴軍中差委，也可以留校，重頭學起。吳佩孚不願重頭學起，而請求差委；因爲尚未畢業，沒資格充任軍官，祇當了憲兵班長。

雖說他很努力，很快的功夫就升到中尉，但究竟尙無正當學歷，於是，他在朋友慫恿下，再到保定，進入陸軍速成學堂，一切從頭開始。因爲他年紀大，又瘦又黑，被分入測繪科。可是，他並不氣餒，努力用功，一年後，以第一名畢業；被另眼看待的復官中尉，派往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正式成爲北洋系軍人，與袁世凱發生縱的關連。

蒐集情報 死裏逃生

他回到天津，不久，奉袁世凱密令，去山東煙臺芝罘島，向日本少佐守田利遠報到。同他一齊前去的，共有十六位初級軍官。

當他們見到守田之後，才知道日、俄大戰即將爆發，他們的任務是：「搜集俄軍情報，通知日軍，再由日軍轉知袁世凱。」

在爲時短暫的情報訓練中，吳佩孚以見多識廣、機智深沉、設計縝密、勇於負責，成爲出類拔萃的人物，也因此受守田的器重。別人認爲無法辦到的事，找吳佩孚，他總會想出辦法來。

日俄戰爭爆發後，爲了偵明俄國東方艦隊的實力和旅順的防務，吳佩孚替守田策劃，成立由中日情報人員合編的密偵隊；借用滿清（中立國家）北洋艦隊的快艇，由煙臺駛過旅順，週而復始，探明旅順港俄軍艦艇的虛實。俄軍起先不明用意，並未重視；等到發覺不妙，也就攔截不及。日軍因此得到準確情報，有助於封鎖戰術的順利成功。

等到陸上進攻旅順的戰役開始，吳佩孚等密偵隊人員，化裝成各色人員，在俄軍控制下的營口偷渡登陸，分成若干小組，晝夜偵探俄軍的動態情報。吳佩孚化裝賣布商販，率領王懷慶、孟恩遠一組，經蓋平往復州，一路默記俄軍人數裝備。終因行藏與當時兵荒馬亂的環境不大適合，在復州車站引起俄軍戒哨的懷疑，準備拘捕拷訊。幸虧吳機警，丟下賣布包袱，飛奔逃脫。在離事先約好準備撤退的海口廿里的娘子宮，找到一位講求義氣的山東老鄉姓李的糧行老板，安定下來。一面設法通知其他各組情報人員來此集合，準備由海路撤退。

回到芝罘，中日隊員都領到一筆優厚的獎金；別人徵歌狂舞，尋歡作樂，吳佩孚却請准了短假，返里

省親。

他離家已經七年了，雖然還談不上衣錦榮歸，但總算有了前程。何況當一名正式軍官，騎着高頭大馬，昂然出現在純樸保守的農業社會，小城市鎮之上，却也够風光的了。同時，由於他已經卅二歲了，所以他娘迫不及待的替他完婚，他一向崇尚孝道，既然女方李家願意，於是也就顧不得祇有七天的假期，匆匆成婚。老太太勸他以結婚爲理由，多請幾天婚假；他却以公爾忘私，守時盡責爲重，於成婚四天後，趕往芝罘銷假。

緊接着一項危險的任務又臨到他的身上，守田的密偵情報隊支持日軍第三軍正面攻擊旅順，嚮導一支日軍，登陸旅順港對面的松木島，聲東擊西的故意引起俄軍的重視，浪擲俄軍砲火。這是一項幾乎等於自殺的行動，吳佩孚能臨危不亂，指導同仁利用地形地物，巧爲掩蔽，減少了無謂的傷亡。日軍攻下旅順之後，守田在吳的陪同下，到天津見袁世凱有所洽商，當即向袁推薦，稱贊吳的傑出功績，等吳再回芝罘，已經升任上尉了。

旅順戰役結束，日軍大舉進攻遼陽，吳佩孚奉命率領十人情報組，往前線搜集情報，以錦州爲連絡中心，守田因爲吳新婚不久，已一再冒險；所以此次讓他留守錦州後方，專負研判處理的職責，轉交關東軍的福島參謀。不料，却反而累他有三月的牢獄之災，而且還被判死刑，幾乎送命。

十月的一天，福島通知吳佩孚，攜帶情報，去新民屯參加秘密會議。新民屯當時是我國軍隊駐守，不

在日俄戰地之內。所以吳乾脆以中國軍官裝束，乘火車前往，可是，中途却橫遭俄軍攔截檢查，因為他攜帶的情報文件箱被搜查，所以他被捕。

吳佩孚被捕，承認自己是中國軍官，情報文件是爲了研究戰史之用，堅決否認他作日軍的間諜。但，蠻橫的俄軍總司令仍判他死刑。幸虧哈爾濱的俄軍情報單位認爲仍應先套問些口供，再殺不遲。於是，先把他解送哈爾濱，中途，他以賄賂的方式，贈送香煙給押解他的俄軍，乘機跳車脫險。

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日俄戰爭結束，日軍勝利，日軍大山總長親自頒贈吳佩孚一座「單日光旭日勳章」，酬庸他在情報工作上的支援。

次年（一九〇六），他才脫離日軍情報單位，回到北洋，被派往第三鎮候差，從而開啓了他此後輝煌事業的契機。

機警善戰 脫穎而出

北洋第三鎮是袁世凱當山東巡撫時的老班底子，可說是袁的嫡系部隊，當時的統制（師長）是段祺瑞。最初段對吳並沒有好印象，祇叫他仍支原餉，等候差使。他準時上班，利用閒暇埋頭研究中外兵法，並且就日俄之戰時所見所聞，加以整理，與我國戰術詳加比較，作成筆記。

由於他志行純正，刻苦向學的敬業精神和卓異表現，使段對他有了新的認識；十月，第三鎮擴編，吳

升任步兵十一標第一營統帶（少校營長）此時，他結識一位牛鼻型的同事張福來，結義爲異姓兄弟，張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唯命是從。

自徐世昌接任東三省總督後，第三鎮奉調開往東北，統制由段祺瑞換滿人鳳山，再換曹錕。

曹錕本是賣布出身，一生庸碌，但却有福命，遇到吳佩孚這個好幫手。吳的一生，與曹有極大關連，曹一直是吳的直屬長官，吳因爲受知於曹，才能以第三鎮起家，充份發揮才智，成就他的威望事業；曹因爲信任吳，才因人成事的成爲「直系領袖」、軍政要人。自民國元年起至民國廿七年曹病逝，二人始終維持「生死刎頸之交」，這和當年朝秦暮楚的軍閥行徑來衡量比較，稱得上「出類拔萃」了。

曹錕接任統制時，吳佩孚還祇是個營長，其所以演變成後來「二人同心」的局面，還是由於吳的傑出表現。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二月，曹錕因爲吳是學測繪出身，叫他去中俄邊界的興凱湖測繪地圖，准他多帶人馬保護，他祇要十六人。經過一個月冰天雪地的的工作，順利完成任務；所繪地圖，詳明正確，曹錕頗爲激賞，從此對吳有了「可付重任」的印象。

辛亥年，第三鎮已調回關內，駐守保定一帶。十月十五日，曹錕親率第三鎮的第一協，西出娘子關，攻打山西革命軍，此爲第三鎮成軍以來第一次正式作戰，吳佩孚是炮兵營長。

第三鎮的進攻軍隊，出動步兵、砲兵各一標（團），由石家莊乘火車，計劃在井陘下車，進攻娘子關。

第一列車裝載砲三標，劉標統和第二、三營在前，吳佩孚的第一營在後。亂哄哄的深夜十一時才開車。由於拂曉即將攻擊，車身搖晃，鼾聲成雷；吳無法成眠，與張福來以電筒照射地圖，一面注意車外站牌名稱，一站一站朝前數。忽然發現一件大秘密，車到井陘，居然不停，當時，他立即偕同張福來，率領一部份士兵前往車頭察看，經過劉標統車廂時，發覺劉和少數士兵已換上革命軍服裝。知道情勢緊急，除了下令扣押自己頂頭上司劉標統外，迅即趕到車頭，抓到兩個革命黨，立即命令司機倒車返回井陘，才挽救了一場全軍覆沒的厄運。因為劉標統已經和防守娘子關的革命軍取得聯絡，故意讓火車開往娘子關，好讓革命軍以奇襲的戰法打第三鎮個措手不及。

吳佩孚立下大功，曹錕對他更爲器重，除了立即升任他爲上校標統（接替劉標統）外，並且改口稱呼他爲「子玉」了。

民國成立以後，第三鎮改爲第三師，吳調任副官長；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派湯蕓銘爲湖南督軍，第三師調駐岳陽。

湯蕓銘在湖南以搜捕民黨爲由，濫殺無辜，湖南人恨之入骨，稱他「湯屠戶」。替湯作爪牙的部份北洋軍，與湖南的民衆之間，有很大的隔閡。惟有吳佩孚常常主持正義，予民衆方便；並且與湖南的紳士，詩酒往還，建立情感。

民國二年十二月，湖南省垣舉行民衆團體大會，吳佩孚代表曹錕到長沙參加。他被邀上臺演說，一反

湯的高壓狂謬姿態，盛贊湖南人重義氣輕生死的美德，主張以「仁民愛物」的胸襟和作法，使軍民真正能打成一片。他的這番說詞，大獲湖南人好感；也使湯鄉銘驚服，認為他有學問、有眼光，才堪大用，想利用他來緩和湖南人對自己的敵意，於是向曹錕情面借調。曹問吳的意向，吳根本瞧不起湯的爲人，當然不願供他驅使，同時也向曹表示追隨到底的忠誠。曹非常高興，保荐吳爲第三師第六旅少將旅長，從此言聽計從。

民國四年十二月，因爲袁世凱宣佈明年更改國體，自立爲帝；雲南護國軍起義，改道入川。次年一月，第三師奉命開入川南，攔截蔡松坡的義師，吳佩孚打前站。

護國軍進入川南，得到川軍劉存厚的響應，勢如破竹，很快攻佔納溪、敘府；重鎮瀘州，指日可下。當防守瀘州的熊祥生和李炳之兩旅正準備棄守撤退時，吳佩孚趕到，迅即親率雄師，以優勢砲火，擊退敵軍，解了瀘州之危，並且渡河奇襲，攻佔太安陽、藍田垠兩大據點。捷報傳出，袁世凱「龍顏大喜」，除了封吳佩孚三等男爵，就連「準敗軍之將」的熊祥生、李炳之，也都得了封爵。

二月十五日，曹錕見吳一戰成功，得了封爵，以爲護國軍已是強弩之末，不堪再擊了。於是，見獵心喜，決定親自出陣，以收肅清之功。當即率領第三師王承斌團、第七師張敬堯的一個旅和川軍熊祥生旅，強渡永寧河，分兵進攻。可是，由於護國軍的奮勇作戰，和曹錕中途處理進退的乖方，不但被打擊得潰不成軍，甚至曹錕本人也被困在一處「死谷」內，進退不得，達兩小時之久。幸虧防守太安陽的吳佩孚得到消

息，親率騎兵來援，才將曹錕救出，收集潰兵，穩定態勢。戰報上去，當然論功諱敗；結果，吳佩孚升中將，連總司令張敬堯都加上將銜，可是副司令第三師長曹錕，却無一字之褒，但也無一字之貶。由此可知曹錕和他的第三師，在北洋系統中的份量了。

由於以上種種事實，吳佩孚與曹錕之間的主從關係，才日漸密切鞏固，而吳也就自然成為曹的靈魂人物了。

駐馬湘南 一枝獨秀

民國五年三月廿二日，袁世凱通電宣佈取銷帝制，六月六日逝世。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發表蔡松坡為四川督軍兼巡按使，曹錕會辦四川軍務。四川情況複雜，川、滇、黔各軍互爭雄長，當然不是久留之地。於是曹錕與吳佩孚商議今後大計，吳以為袁死後的北洋大局，惟有實力是賴，自己要能有所發展，更上層樓；一方面要依靠有實力的後臺，一方面必需發展自己的實力。當時有實力能控制北洋的，為段祺瑞和馮國璋。段已任國務總理，不能不明修他的道路；馮與曹同為直隸人，氣味相投，也不能不暗中聯繫拉攏。

因此，當段祺瑞拉攏曹錕，想收為己用時，曹一拍即合的遵令調返保定，就任直隸督軍，仍兼第三師長。立即全力支持吳佩孚擴充基本武力，編練新軍。

吳佩孚練兵，有一套特別的辦法；儘量避免北洋軍的惡習，嚴格要求恪守軍紀。他懸有五大禁例：

1. 不得懈怠防務，托故請假。
2. 不得向民間除欠挪借。
3. 不准動民間一草一木。
4. 必需保護駐區人民。
5. 遇匪應即奮力掃除。

在此原則之下，一面招募壯丁，一面改組保定附近的巡防防營；短短的一年半，除補充第三師足額外，還另增編成七個混成旅，使曹錕的實力擴充三倍半。從此，吳佩孚把曹錕推上北洋的政治舞臺，而他自己，也因爲實際掌握了大部份曹的部隊而脫穎而出，開始受到各方重視。

在此期間，正是段與曹相處極融洽之時；吳佩孚還間接的被段利用，開了軍人干政的惡例。

段祺瑞爲了向德國宣戰問題，使用威脅手段，跟國會鬧翻。國會決議請黎元洪總統免段總理職，「以戰武人團結要挾」之風。段被免職，縱動部份軍人，在天津組成「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宣佈脫離中央政府。一面派兵兩路，北上京畿，威脅元首，吳佩孚就是其中的主力。他是奉曹錕之命，率領第三師第六旅前往蘆溝橋，列陣京都，成爲政爭工具的。

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請來辦帥張勳以爲調停。不想引狼入室，惹出「復辟」風波，段祺瑞反而以維

護民國、討逆伐罪的立場，在馬廠誓師，進兵北京。曹錕成爲討逆軍的西路總司令，吳佩孚又成爲前站先鋒，兵貴神速的進駐宛平，攻入豐臺車站，活捉逆軍司令部的大將雷震春、張鎮芳、馮成麟。

復辟失敗，黎元洪也辭職不幹，副總統馮國璋由南京進京，代理總統。馮與曹同爲直系，當然對曹拉攏，發表他兼直隸省長。同時，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仍然大權在握，不但堅持其「對德宣戰」政策，而且也有武力統一全國的野心，所以也把曹錕當他的功狗。曹錕當此微妙關係，正好左右逢源馮、段之間，予取予求。同時，也對吳佩孚敬愛備至；不但讓他接任第三師師長職務，指揮所有曹的部隊，而且逢人贊揚吳是他的「蕭何」、「諸葛亮」。

由於黎元洪被迫廢棄約法，解散國會；國父孫中山先生請國會議員依法擇地開會，行使職權。於是，在廣州集會，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護法政府），推舉國父爲陸、海、空軍大元帥，高舉護法旗號。因此，西南各省乃與武人把持的北洋政府形成對立。段祺瑞「武力統一」的迷夢正好找到藉口，於是，不惜舉外債，啓戰端，進兵湖南，于民國六年八月六日，發表愛將傅良佐爲湖南督軍，率北洋勁旅第八師王汝賢和廿師范國璋部長驅南下，攻佔衡山、寶慶，直向零陵。

譚延闓等的湘軍分向廣東、廣西求援，於是，廣東督軍陳炯明連絡桂軍總司令譚浩明，組成聯軍，大舉援湘，聲勢浩大。一場比較慘烈的戰爭，將會造成北軍的重大傷亡。

王汝賢、范國璋權衡輕重，雅不願爲貫澈段的武力政策，再「塗炭生靈」了。當在前線發表通電，商請

雙方停戰，一面撤回長沙，湘桂粵聯軍立即跟進。傅良佐張皇失措，棄職逃往岳州。

王汝賢、范國璋虎頭蛇尾，無功而還，引起段祺瑞和馮國璋之間的誤會。因為馮不肯處罰王、范，而將傅良佐免職，並且策動直系將領通電主和；段爲之一怒辭職，由其心腹徐樹錚奔走四方，邀約一批華北的方面大員督軍、都統之流，在天津開會，居然捧出曹錕爲盟主，（據說以推戴彼當副總統爲條件）再通電主戰。等到吳佩孚由保定趕到天津勸阻，已經來不及了。

馮國璋無奈，祇好於民國七年一月卅日下令南進，任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張懷芝爲湘贛檢閱使、張敬堯爲攻岳前敵總司令，各分別兼任第一、二、三路總司令、段祺瑞也恢復原有的權位。

「曹不離吳」，吳佩孚自然成爲第一路的前敵總司令，帶着他的節制之師第三師和一部份混成旅南下湖北。張敬堯爲取地盤爭功，又將吳留爲第二路；而改命自己第七師的勁旅吳新田的十三旅打頭陣，進攻羊樓峒。不料吳新田正好遭遇湘軍虎將李仲麒的驍勇善戰，不但未能成功，反而慘敗後退，一直退到通城。於是，吳佩孚的第二路接替上去迎敵。

可是，南軍除了李仲麒外，增援的部隊陸續到達，又連成湘、桂、粵軍的聯防戰線。吳在第三師的各旅到齊後，發動總攻，他自己三天兩夜不眠不休，終於窺破敵陣弱點，掌握戰機，特奮奇兵，中央突破，一舉成功。於是，下岳陽，入長沙，長驅直進，駐馬衡陽。

北軍之所以能勝利成功，完全是吳佩孚第三師的功勞。但段祺瑞皖系的派系私心，竟發表百無一是的

張敬堯爲湖南督軍。

雖然，吳並不想當督軍，可是，段祺瑞的氣度作風，已使吳本人和第三師受到教訓；再加張敬堯的貪婪不法和部屬軍紀之壞，也使吳受很大的刺激。他覺得不該再依人作嫁的成爲御用的鷹犬，而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構想與奮鬥目標。

因此，此後的吳佩孚，無論在思想、氣度、魄力上，都有顯著的改變。雖然他始終並未有脫離曹錕，自樹一幟的打算，然而他的種種作爲和聲望，遠超過他的師長地位，而曹、吳齊名並駕了。

衡陽撤防名聞中外

吳佩孚在衡陽，不但不再作征南的打算，甚至處處爭取湖南人的好感，與衡陽名流往還，詩酒唱和。在漢口的曹錕，也帶幾個混成旅，不待段同意，自行北撤。

段祺瑞眼看「武力統一」政策，勢將前功盡棄，於是，採納徐樹錚建議，直接對吳示惠，發表他爲爭威將軍。並且由徐親赴衡陽與吳密談，面允由段直接補助吳巨額軍費，即席賦詩「衡州謠」稱贊吳：

「……吳公之來爲民福……恂恂乃作儒者服，閭巷無復夜叩門，軍令如山靜不紛……妻女生歸繞膝行，人間此樂得難再。吳公愛民如愛軍，與愛赤子同殷勤。吳公治軍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老民幼嘗事書史，古今名將誰及茲？……」

徐樹錚如此取悅於吳，自以爲已經說服吳佩孚；同時，張作霖撥給他的六旅奉軍，也在陸續南下。於是，他在漢口成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計劃以吳佩孚打前鋒，六旅奉軍爲後繼，張敬堯的第七師爲總預備隊。段也電催吳進兵兩廣，預許廣東督軍一職爲酬庸。

可是，霹靂一聲，六月廿五日，吳佩孚却跟湘軍譚延闓、趙恆惕成立停戰協定。曹錕對徐樹錚直接與吳聯絡，也大不滿意。同時，張作霖也將被徐南調的六旅奉軍全部調回。事實發展如此，段的「武力統一」又成爲畫餅了。

另一方面，吳佩孚也痛恨皖系以不正當手法包辦「安福國會」，一再擅借親日貸款，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八月七日，他致電江蘇督軍（直系）李純，痛斥「武力統一」的亡國政策，反對包辦民意的選舉。電文中警句如：

「……政府不受法律約束，偽造民意，實等專制……內爭年餘，軍費全由抵借借款殺同胞，何異飲鴆止渴？……傳以操切禍湘，徐以違法而殺陸（註：指徐樹錚擅殺陸建章），政府賞罰倒置，而猶以叛逆責人，大張撻伐，豈乃謂平？……」

八月廿一日，再通電全國，呼籲和平，息爭禦侮，希望「文官不貪污賣國，武將不爭地盤」，他自己聲明今生今世「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

吳佩孚一再通電，不但揭開皖系的假面具，而且也傷到段的面子尊嚴。於是，段也電斥吳：「師長職

卑，對大局無發言之權」，曹錕身在北方，爲了避嫌，也電吳：「幸勿再逞意氣，致貽他人口實。」

然而，吳以師長之「卑」，却能「言人之所欲言」、「諫人之所不敢諫」；從此，往往議論時事，每通電發出，都獲得相當好評與較普遍的響應。風頭之健，令人刮目相看。

民國七年，馮國璋代理總統期滿，國會將改選總統。由於不滿皖系「安福國會」的把持，馮國璋宣佈放棄競選；九月四日，「安福國會」選出徐世昌爲總統，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就任參戰督辦。

當時，北洋的大勢是直系、皖系和奉系鼎足而立的局面，直系以馮國璋爲首，曹錕爲副，以長江的江蘇、江西、湖北三督軍爲骨幹，吳佩孚的堅強實力爲後盾。皖系以段祺瑞爲首，徐樹錚爲中心，專以翻雲覆雨的手段，利用他人，控制局勢。奉系以張作霖爲首，以東北爲基地，本來是徐樹錚利用他來衡制直系的，但他等到羽毛豐滿後，不願再受皖擺佈，而獨行其事。

段祺瑞鑒於皖系沒有屬於自己的基本武力，依賴他人不可靠；於是利用日本借款與軍火訓練新軍（即參戰軍），作爲將來統一天下的資本。後來改爲邊防軍，發展到三師四混成旅，經營西北；但却引起張作霖的猜忌，而與直系聯絡，共同對付皖系，尤其是徐樹錚。

因此，民國八年秋冬之間，東北三省和江蘇、江西、湖北、直隸七省聯合起來反對徐樹錚，向段叫出「清君側」的口號。徐是段的靈魂人物，邊防軍也在徐掌握之中，當然段不能接受。於是，一場壁壘分明的衝突，越來越深重了。

當年十二月廿八日馮國璋病逝，曹錕成爲直系領袖，吳佩孚的地位更爲重要，他和曹一南一北，遙相呼應。

民國九年一月十七日，吳佩孚一份堅請撤防的電報，由曹錕轉到北京。段祺瑞爲了阻止他北撤，却擬發表自己的內親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接替守中立態度的河南督軍趙倜，但却引起吳佩孚的激烈反對，通電指示：

「疆吏非一家之私產，政權非一系之營業。安福跳梁，政綱解組，窮兇極惡，罄竹難書，稍有血氣，咸不欲與共戴天……。」

火氣之大，發言之重，已達劍拔弩張程度。

結果，段更換河南督軍不成，反而把趙倜逼到直奉聯合的一邊，七省成爲八省。

奉、直兩系聯合倒皖系的態勢已成，第一個打前鋒的實際行動者，就是率領直系主力勁旅的吳佩孚，第一步行動：「撤防北歸」！在其一連串請求北撤電報中，流行最廣的電文如：「遠戍湘南，瓜期兩屆，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閭閻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

段祺瑞雖然用盡方法，延緩吳的撤兵之請，但最後北洋政府祇好同意吳兵北撤。

五月廿四日，吳佩孚率第三師和三個獨立旅，堂而皇之，開始撤防北歸。沿途令士兵高唱他自己填詞

充滿忠義之氣的「滿江紅」，又稱「登蓬萊歌」：「北望滿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却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

吳的撤兵舉措，一反當時武人爭地盤擾民衆的惡習。而數萬雄師，秩序井然，所過之處，遍受地方民衆歡迎，吳佩孚成爲中國人的新希望；撤防的舉動，成爲轟動中外的大新聞，有些報章，歌頌他爲「新中國的大英雄」。

吳在撤防之先，曾通知湖南督軍張敬堯派軍接防，張派暫編第二師師長吳新田爲「主持湖南防務司令官」，於五月廿一日到衡州與湘軍代表簽約，南北兩軍維持原有停戰線。

可是，由於張敬堯在湖南的罪惡滔天，湖南人飽受張部的姦淫、殺人、搶劫之害，早有「驅張請願團」的組織與活動。吳軍一撤，湘軍立即發兵攻張，五月廿六日發動總攻擊後，以數千械彈缺窳之師，一鼓作氣，下衡陽，進長沙。張敬堯數萬之師，早因搜刮巧奪而士無鬪志，不戰潰逃。湖南歸入湘人掌握，推戴譚延闓、趙恆惕負責，叫出「湘人治湘」口號。

段祺瑞惱羞成怒，斥責湘軍背棄信義，破壞和平，建議北京政府明令討伐。一面指使陝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聯名通電討伐湘軍；並以「吳軍甫撤，南軍即進，恐有勾敵情事」，請求查辦吳佩孚。

結果，徐世昌拒下討伐令，吳佩孚也查辦不成；而吳軍北撤後，倒段的機勢已經成熟，段和他的皖系開始走上失敗的途徑了。

直皖戰爭大展將才

吳佩孚乘自己如日中天的聲望，巧妙運用政治手腕，廣結外援。於是，由曹錕派出代表，分赴當時尚保持中立的各省，宣佈皖系的罪狀，遊說合作。結果，原來八省聯盟，擴大為十三省，提出吳佩孚的政治主張：

1. 各省防軍，一律撤回原防地（唯南軍例外）。

2. 擁護靳雲鵬內閣，不反對段祺瑞；但却必須罷黜徐樹錚。

3. 宣佈安福系的罪狀，請求政府強制解散安福國會和安福俱樂部。

當時，皖系無論在外交上、財政上、作戰的戰略地位上，都處於不利地位。最重要的兩大缺點，一是發動戰爭；在全國人心盼望和平統一的時候，內戰是失去同情的。另一是親日，當全國人心，因為歐戰後山東問題而極端反日時；皖系專門倚賴日本為奧援，更失人心。

在軍事部署上，直系的主力部隊，集中在河北、河南一帶；皖系的邊防軍主力，分散在京畿、陝西、山東各地。

直皖戰事，山雨欲來之際，總統徐世昌想以調解方式予以化解；於是電請張作霖、曹錕、李純入京會商，作爲調人。結果，曹、李不來，祇有張應命入京；與徐會晤後，拜訪段祺瑞，勸他不妨稍加讓步，撤換徐樹錚，保全安福國會。段却以「同時撤免吳佩孚」爲惟一交換條件。

徐爲皖系中心人物，與段實爲一人；吳爲直系靈魂人物，與曹表裏合一。任何一方，都不願在爭執之中，以撤免他們的職務，爲讓步的條件。事情發展至此，已在弦上的直皖大戰，無可避免的勢在必發了。

爲了避免兩面爲難，既爲皖系健將又爲張作霖兒女親家的靳雲鵬，辭去國務總理職務，由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七月三日，報載曹錕、吳佩孚、李純聯名通電，宣佈徐樹錚六大罪狀：1.禍國殃民；2.賣國媚外；3.把持政柄；4.破壞統一；5.以下弑上；6.以奴欺主。七日，總統徐世昌下令免去徐樹錚西北邊防總司令職務，特任遠威將軍，留京辦事。

段祺瑞認爲「免徐職」爲一大恥辱，乃以強迫手段，強徐世昌於八日下午「懲辦曹吳」之令，吳免職，曹則褫職留任，以爲報復。

直皖兩軍戰區，分東西兩路：東路在京津鐵路沿線，西路在京漢鐵路沿線。皖軍稱「定國軍」，以段祺瑞爲總司令，徐樹錚爲參謀長兼東路指揮，段芝貴爲西路指揮。直軍稱「討逆軍」，以曹錕爲總司令，吳佩孚爲副總司令兼西路指揮，曹錕爲東路指揮。兩路都是皖軍先攻，直軍還擊。

東路，七月十五夜，皖軍邊防軍第三師兩個團和西北第二混成旅，約一萬五千人，向楊村進攻；直軍第

四混成旅和直隸警備軍約二萬人還擊。十六日直軍已佔優勢，忽自天津開到日軍護路隊，強迫直軍撤移部署於楊村站附近的砲兵陣地。皖軍乘勢湧進，壓迫直軍退守北倉、李家嘴一帶。十七日，奉軍前頭部隊一營來援，直奉聯合反攻，直逼廊房，皖軍潰敗，從此一蹶不振。

西路，七月十四日夜，皖軍以邊防軍第一師、第三師（欠兩團）北洋軍十五師爲主力，由涿州向南進攻，最初頗有進展，已佔領高碑店。十七日，吳佩孚親臨前線，率部繞道突擊位於松林店的皖軍前敵總部，生俘指揮官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和司令部全體將領，皖軍大敗潰退。直軍乘勢收復涿州，向長辛店追擊。

身在東線已面臨失敗的徐樹錚，聽說西線也已失敗，匆匆趕返北京，作亡匿之計；他所指揮的邊防軍，遂不戰而投降直軍。

皖軍的西路總司令，也和曲同豐一樣的毫無戰場的警覺性。雖然以火車爲司令部，但不是準備隨時向前推進的，而祇是便於倉皇逃脫。前方戰況激烈，他却在火車上打麻將抽鴉片烟；遲遲不派遣援兵。等到吳佩孚率兵逼近長辛店，他即下令開車退入北京。於是西路的邊防軍和北洋十五師（原爲馮國璋由南京帶往北方的部隊）也都投降直軍。

直皖之爭，直勝皖敗，自然皖系人物徐樹錚、段芝貴、曾毓雋、李思浩等「十大禍首」遭到通緝法辦的處分；但却給段祺瑞留有餘步，祇免去其一切職務，沒有把他當作罪犯通緝。

直軍此次所以能迅獲勝利，吳佩孚的功勞最大，聲望也更爲上昇。他想乘此輝煌的軍事勝利，實現他的政治主張。於是，自廿九日起，連續發表他的國是意見：解散安福國會、由國民自行召集國民大會統一善後、制定憲法、修正選舉辦法、解決一切重大問題。

然而，他這些主張，却被徐世昌、曹錕、張作霖一致否決，張並且向記者表示他對吳佩孚的看法：

「國家大事，一向祇和曹經略使商議，吳佩孚祇是區區師長。我國師長有好幾十位，就是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讓他們干預政治，那還成話嗎？」

不但張作霖對他如此，就是曹錕，也和他有了距離。當吳佩孚大聲疾呼，解決國是之時，曹錕却忙着和張作霖攀交情、結親家、經濟勒索、政治分贓，種種醜聞，令吳氣結而難以自處；同時，他也有感於張作霖的氣餒之高，奉軍的惟利是圖，直奉之間，將來難免決裂。

因此，當九月二日，北京政府發表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爲副使；曹命吳駐軍小站，拱衛京畿之時；吳却另有打算，率領第三師駐節洛陽，遠離京、津是非之地，埋頭練兵，爲將來的直奉衝突，預作準備。常常書寫對聯贈人，舒暢他的心懷，對聯爲：

欲平大難須嘗膽，誓掃倭人不顧身。

花開陽春惟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峯。

無往不利威震兩湖

吳佩孚在洛陽練兵，與北方的曹錕密取聯繫，遙爲呼應，將直系勢力向四方推展。

湖北督軍王占元，當直皖戰爭時，並無戰功。但却因爲湖南創制省憲，宣告自治；他便成爲北洋政府對南方強敵的先鋒。加上他兼有兩湖巡閱使的頭銜，所以地位日見重要。

民國十年五月初，內閣總理靳雲鵬（已復職）爲了選舉、征蒙、西南、財政種種棘手問題，無法解決；特地電請三位巡閱使張作霖（東三省）、曹錕（直魯豫）和王占元到天津開會。王占元表面上以溝通中央與西南各省意見爲己任，實際上以討償歷年積欠軍餉爲目的。

會議結束，王占元得到兩百萬元軍餉，回到漢口，並未立即轉發他的部下，反而飽入私囊。於是，六月四日，駐宜昌的第一混成旅首先發生兵變，搶擄燒殺，殃及洋人。王立派十八師師長孫傳芳馳往彈壓，亂事方平。七日，武昌第二師的七、八兩團也發生兵變，王派人分別勸促亂兵解散，聲明各人搶刼到手的財物，任聽帶走；另各加發恩餉兩月。亂兵信以爲真，集合一千八百人，乘車往孝感，但却被王事先埋伏的第四混成旅劉佐龍部一舉槍殺。經過這兩次兵變，王占元不卹人命，殘暴不仁的作風；不但他的部隊人人自危，兔死狐悲；就是地方百姓，也感到日坐愁城，朝不保夕。

當此之先，湖北的士紳孔庚、黃恭輔等曾在北京開會，要求北洋政府撤換王占元；沒有結果。湖北的

革命先進、軍界要人李書城、蔣作賓、吳醒漢等，集會長沙，宣佈湖北自治，商請湘軍趙恒惕出兵伐罪攻鄂。七月廿日，湘軍開會決議「援鄂」，宣言驅逐王占元後，「將鄂事歸還鄂人」。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選蔣作賓爲「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總監」、孔庚爲政務處長、夏斗寅爲湖北自治軍前敵司令，率領留湘的鄂軍（約千人）參加「援鄂」。

王占元當此衆叛親離之下，祇好打出他的王牌，調鄂西的孫傳芳和曾替他擔任劊子手的劉佐龍防守鄂南，抵抗湘軍。同時向雄據洛陽的吳佩孚求援。

孫部雖然善戰，但湘軍却異常奮勇，鏖戰八晝夜，湘軍擊敗孫軍，進克蒲圻、通城，直指咸寧。

吳佩孚接到王占元的求援電，起先，按兵不動，後見情勢危急，立派第廿五師蕭耀南部和第八混城旅靳雲鵬部南下。先以靳部接替孫傳芳防務，穩住陣腳；再以蕭部大軍繼之。

王占元當然希望此兩部雄師能發動攻擊，將湘軍打回湖南，替他保全權位。可是，他們却都按兵不動。

王占元知道大勢不妙，加上全國輿論的斥責，湘鄂民情的激憤，祇好通電辭職。離鄂去天津，八月九日，北京政府發表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爲湖北督軍。

湘軍看到吳佩孚來鄂，想起以往他在衡陽時的力主和平，當然不願與他爲敵。同時，驅王已經達到目的，全國也不願湖北再有戰事。因此，不但湘軍一再表示願意和平；全國各界也有通電，主張停戰。梁啓

超甚至電吳佩孚：「勿將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於肩背」。

可是，此時吳佩孚的見解和抱負，已與以往大異其趣，他也主張「武力統一」的策略了。於是，不願過去與湘軍的情誼，要求1.湘軍應全部退出湖北2.懲辦製造戰爭的湘軍師長宋鶴庚、魯滌平。至於任命蔣作賓爲湖北省長，可由北京政府考慮外，其他廢督、自治等問題都予否決。

於是，戰爭再度爆發，湘軍雖然奮勇，並有桂軍沈鴻英之助。但吳佩孚的善於用兵和其訓練精良的勁旅，海軍的支助；結果，湘軍大敗，長沙幾告不守。幸虧川軍援湘之師已到宜昌，吳不無顧慮；加以英國駐長沙領事的自請調解，才成立一項和議，湘軍不但撤出湖北，而且還失去岳陽，雙方以汨羅江爲界；所謂「鄂人治鄂」、「聯省自治」，都成了泡影。

川軍「援鄂」之師，是由川軍第一、二兩軍各抽調若干混合編成，派湖北籍將領潘正道爲前敵總司令。九月二日，已攻抵宜昌南岸。吳佩孚解決了湖南戰事後，立即派兵增援宜昌的第十八師。十六日，吳親往督戰，經過一個月的力戰，終於擊敗川軍，將其全數逐回川境。

於是，吳葆孫傳芳爲長江上游總司令，駐宜昌一帶，對付川軍。湖南，則由曾經以奇襲戰法攻佔岳陽的張來福負責對付；自己仍返回洛陽，繼續練兵。而其無往不利，揚威兩湖的事實，更導致他不知覺的陷於權力支配的慾念之中。於是，當川軍楊森失敗之時，他以武器實力支助楊森，鼓勵其重行入川，作統一控制之想。當國父孫中山先生開府廣州，力主北伐時；他又以收買賄賂的方法，促使海軍總司令溫樹德

、陸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使國父險遭不測；促使黔軍王天培、彭漢章兩旅長，背叛黔軍總司令谷正倫，影響北伐陣容。種種行爲，層出不窮，無形中成爲國民革命的一大障礙、頭號敵人。

另一方面，張作霖本來把吳佩孚看得很低，沒有好感；自吳發表爲兩湖巡閱使後，張以爲吳已與他並駕齊驅；更公開表示不滿，因而引起吳對他的反感。加上他過份重視與直系之權利之爭。於是，逐漸的奉直之間裂痕不斷加深；終於引起一場激烈的爭執，不惜訴諸武力。

以弱擊強開府洛陽

直奉第一次大戰的導火線，是張勳的復出問題和梁財神內閣問題。

張作霖眼見吳佩孚以直魯豫巡閱副使兼兩湖巡閱使，吳的部將蕭耀南得了湖北督軍，非常嫉忿；於是一連三次力保他的親家張勳爲蘇皖贛巡閱使，想以此略分曹吳之勢。曹吳當然不甘緘默，尤其吳佩孚，以張勳爲「復辟」罪人，何能再任要職；反對最力。張以所求未遂，感到難堪；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關晉京，以財政等問題，迫使原來由他和曹吳共同支持的靳雲鵬內閣辭職；而力捧有財神雅號的梁士詒組閣。

梁士詒本是袁世凱搞帝制時的健將，帝制取消，袁死以後；他曾是受通緝的「禍首」。皖系垮臺，他想東山再起，利用交通系活動張作霖，以優先爲奉軍籌餉，聯絡南方，對付直系爲條件。徐世昌在張的力

保之下，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廿四日發表梁爲內閣總理。梁上臺六日後，即下令赦免因直皖戰爭失敗而被通緝的安福系要角段芝貴、張樹元等。一面扣發吳佩孚的軍費，一面發行不宣佈用途的「九六公債」；甚至應允借日本人的錢，向日人贖回本是德國人興築的膠濟鐵路，仍然歸日人經營。

於是，全國輿論大譁，指斥梁賣國媚外。吳佩孚乘機通電痛擊，一連六電，斥其「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悍然爲之」，抨其「應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光明」。接着吳便聯合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陝西六省督軍省長，電請徐世昌免梁士詒職；否則，六省與梁閣脫離關係。雖說梁士詒也曾一再通電爲自己解釋，可是，蛛絲馬跡，衆怒難犯；祇好請假，于元月廿三日去了天津。暫由顏惠慶代理總理。

接着，奉張與洛吳之間，相互通電攻訐，張作霖態度強硬，已調動大軍進關，準備戰爭。因爲張曹是親家，所以曹錕還想設法調和，息事寧人。於是曹銳、曹瑛、王承斌等奔走奉張之門。可是，張却提出雙方無法接受的條件：1.梁士詒復職2.黜免吳佩孚3.段芝貴當直隸督軍4.京津地方，完全劃歸奉軍駐防。

四月十一日，直系在保定開會，在吳佩孚的堅持之下，決定與奉張開戰。曹錕爲了表示支持吳的主戰，不惜將主和的曹銳師長職務免去，所有部隊，交吳全權指揮。

直奉第一次戰爭，東路在津浦線，西路沿京漢線以東地區進行。

直軍以吳佩孚爲總司令，設總部于涿州動員十萬人，共八個師五個混成旅，直接參加的主力，爲西路

琉璃河的第三師，中路固安的王承斌廿三師，東路馬廠的張國榕廿六師（師長原爲曹銳）和張福來的廿四師。

奉軍張作霖自爲總司令，設總部于落岱，動員十二萬五千人，東路以張作相的第廿七師，張學良的第三旅，李景林的第七旅爲主力；西路以張景惠的第一師、鄒芬的第十六師、鄭殿陞的第二混成旅爲主力；中路九個混成旅又五個補充旅爲主力，歸張作霖親自指揮。

戰爭于四月廿九日爆發，奉軍先攻；整個戰事，東起馬廠、中經固安，西迄長辛店一帶。奉軍炮多械精，且有騎兵助陣，最初頗爲有利，五月三日夜，吳佩孚親在戰爭最激烈的西線，窺伺戰機，當他推測奉軍砲彈將罄之際，一面嚴令守軍反攻，一面派孫岳率一旅之衆，繞道襲敵側後，一戰決勝。五日，攻佔長辛店，奉軍第十六師投降，第一師及其他部隊，紛紛潰逃；軍糧器械，被直軍擄獲達七十餘輛列車。中路東路方面，直軍也先敗後勝，攻佔僅離落岱祇五十里的永清，追到天津以西的芳勝橋。張學良、郭松齡負傷潰逃。奉軍各路俱敗，祇好下令退却。後來經過協議，奉軍全部退出關外，北方政局，完全在直系控制之下。

當然，梁士詒、葉恭綽輩遭到褫職的命運。

接着，吳佩孚提出「恢復法統、重開國會」的主張。他之所以出此，是大有深意的。因爲南方藉口自立的就是護法，反對北方袁世凱時所訂的新法，所以成立護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復了法統，南方政府

就失去了自主的藉口和根據；豈不是在政治上不戰而勝？如迎接黎元洪復職，補足他未任滿的總統任期；那麼，國會和總統仍將在直系控制之下。於是，一面由一部份軍人通電，贊成恢復舊法統。六月一日，舊國會議員二〇三人再聯合發表宣言，指斥徐世昌為非法總統（安福國會所選），逼他辭職。

雖然，此一「舊法統」，在法的解釋上，有些不同意見，南方政府與浙江的盧永祥，都通電反對，黎元洪自己也是一陣作態；但六月十一日，黎終於在國會代表吳景濂、王家襄和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之下，由天津返北京，宣佈恢復總統職位。

同日，吳也致電國父孫中山先生、伍廷芳、李烈鈞，請他們北上，共商國事。可是，原受吳支助的陳炯明正發動叛變，國父避登永豐艦，七月，陳且聯合趙恆惕、雲南唐繼堯等，主張召開聯省自治會議，與吳對抗，大唱反調。吳的因實行恢復法統而導致全國統一的構想，仍然未達目的。

吳於七月凱旋回洛陽，表示他絕無權位之想，但實際上對內閣人選，多所干預。一面擴練軍隊，最盛時期，歸其直接統轄的有五個師一個混成旅和若干獨立團，分佈於河南、湖北、陝西；擁有精兵十萬，飛機卅架，還有湖北督軍蕭耀南，駐守岳州的張福來等部，也都聽其直接指揮。中外人士，仍常訪問洛陽，傾慕風采。吳的聲望、力量，都已超越曹錕之上。

另一方面，曹錕弟兄，意得志滿，腐化、驕奢的情形，與洛陽的儉樸肅穆，成為鮮明對照。於是，雙方幹部的各具私心，從中挑撥，逐漸貌合神離，分成「津保」與「洛陽」派，加上吳佩孚，安排馮玉祥出

處，有欠考慮，於是導致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短短的兩年多時間，直系由盛而衰。

曹錕賄選變生肘腋

引起直系分裂最大的近因，是選舉總統問題與內閣控制權問題。

民國十一年十月，國會開會，「津保」方面主張先選總統再行制憲；「洛陽」方面主張先制憲再選總統。曹錕當總統，取黎而代之。吳以爲曹最好等南北統一後再出而競選；而不主張曹此時先做總統。於是，曹錕等人，即乘機挑撥，誣指吳本人想做總統。因此，曹錕不再接受吳的忠言，吳也自避嫌疑，不好再出面反對此事。

當時的內閣總理爲王寵惠，是吳佩孚所支持的，「津保」與「洛陽」方面往往向內閣索餉，數目龐大，籌措爲難。於是，財長羅文幹乃與西方債權國家密商，以整理舊債爲由，向四國銀行團進行新借款。義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簽定奧款展期合同的要求，內閣得到八萬鎊的補足款折合國幣六十萬元。以十萬元提充中央政務費，餘下五十萬元，本來應當「津保」、「洛陽」平分；但「洛陽」派閣員高恩洪等却想出瞞天過海之計，不用提國務會議討論，由總理批准辦法，全部滙往洛陽。此事被人向「津保」派告密，曹錕也很光火，乃由「津保」派大將吳景濂等以國會密告方式，脅迫黎元洪下令扣押羅文幹，說他貪污。（經辦本案，未經提出國務會議討論）

內閣以總統祇根據個人密告而下令扣押閣員是違法的，提出抗議，吳佩孚也電責黎違法，而支持王內閣，力促開釋羅文幹。於是，羅獲釋回家。

可是，「津保」派不依，一面慫恿曹錕通電痛責羅文幹喪權辱國，主張澈底追究，脅迫黎元洪斥吳佩孚「不得干預政事」；一面由王承斌等聯絡江蘇、江西、安徽、山東、浙江各省督軍和海軍司令等，一致通電痛斥羅文幹，替曹錕撐腰。吳佩孚祇好通電不再過問此事，並表示對曹錕的服從，對黎元洪的擁護。從此以後，「津保」派「洛陽」派距離越拉越遠，吳與曹之間過去的默契、信任，也打了折扣。於是，「津保」派在吳景濂、王承斌、曹錕等安排下，公開的用賄賂的手段，迫不及待的於民國十二年十月五日把曹錕「選」上總統的寶座。這其間，還以北京全城軍警罷崗索餉的手段「逼宮」，逼黎辭職出走；王承斌且在天津車站扣留黎總統勒索印信。吳佩孚祇好沉默看彼等胡鬧，既無從反對，也有口難言，而以不發賀電，暗示其立場。

曹當「選」後，爲了酬庸捧他當「選」的功臣，升任齊燮元（原江蘇督軍）爲蘇皖贛巡閱使，湖北督軍蕭耀南爲兩湖巡閱使，王承斌爲直魯豫巡閱副使兼直隸督軍；吳佩孚也由直魯豫巡閱副使升爲正使，但却開去了兩湖巡閱使（改由蕭耀南升充）。

吳佩孚在北京政治上受到打擊，可是他却認爲「武力統一」最重要，而忙於征閩、入川、攻粵。入川，係利用支援楊森重整旗鼓的關係，伸張其勢力；征閩則以驅除王永泉爲由（王受徐樹錚利用搞政變，一度

成立「建國軍制置政府」，派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率直軍勁旅，攻入福建；攻粵，則秘密與陳炯明等聯絡，相機行動。

曹錕非法當「選」，國人憤怒，浙江的盧永祥事先曾通電反對，國民黨即於十月七日發表宣言，申討曹錕，九日，國父致電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一致行動，討伐曹錕；十日，再致電各國外交團，請否認曹錕爲總統，（當時盛傳張、段、孫三角同盟）。

奉軍自民國十一年五月戰敗後，當然不甘心；張作霖爲了雪恥圖強，整軍經武，伺機行動，原非一日。現在有了曹錕賄「選」的好藉口，於是約好盧永祥聯合行動，準備分兵五路，入關進攻直軍。

直軍爲了達成各個擊破的目的，利用閩、蘇、贛、皖合圍浙江的優勢，先下手爲強的於民國十三年九月三日進攻盧永祥。四日，張作霖通電助盧，八日，張作霖宴請各國駐奉領事，聲明奉軍因受直軍壓迫，即將開戰。於是，第二次直奉大戰，又爆發了。

雖說，盧永祥受不住來自江蘇齊燮元；和福建孫傳芳兩枝直軍的夾攻，很快失敗；但這一次直軍，無論在戰爭的政治號召上，軍隊的實力上，和團隊的精神上，都比奉軍劣勢。

政治號召上，討伐非法賄選，光明正大，直軍無法辯解。軍隊實力上，奉軍有較新式的大砲、飛機，部隊整訓兩年，養精蓄銳；直軍武器裝備較少改進，部隊久戰疲乏，戰力不平均。團隊精神上，王承斌自成一派，與張作霖有勾結，與吳佩孚貌合神離，還有馮玉祥的心懷叵測。

談到馮玉祥的心懷叵測，固然，吳佩孚有點失策，但馮跋扈驕妄，也有關係，馮玉祥本來是陝西督軍，第一次直奉大戰時，他聽吳的命令，由陝西進兵河南，解決了河南督軍趙倜的內叛行動，安定了直軍的後方，戰後，因功調任河南督軍。但他却心狠手辣的擅將已向吳反正，經吳發表爲河南軍務幫辦的師長寶德全殺害，又私自擴充軍隊；在在引起吳對他的疑忌。加以吳的把兄弟勇將張福來，有戰功尚未酬庸。於是，吳才設法將馮調爲陸軍檢閱使，部隊開往北京南苑；而由張福來接任河南督軍。此事，馮不自行檢討，而認爲受吳愚弄排擠，當然耿耿在心，要伺機報復了。

直奉二次大戰，奉軍總司令張作霖，直軍吳佩孚；分兵三路，第一路直軍兵力三個師四萬人爲主力，由彭壽莘指揮，與榆關方面的奉軍張學良對抗，第二路一師三旅，與熱河、朝陽的奉軍李景林部對抗，由王懷慶指揮；第三路一師二旅，自古北口出承德赤峰，由馮玉祥指揮。另以張福來爲援軍總司令，率一部份軍隊，在北京待命出動，吳軍的通盤計劃：由第一路與海軍聯合進攻瀋陽，第三路繞攻瀋陽後方，相與呼應，第二路取守勢。

可是，由於直軍的軍心士氣，遠非第一次大戰可比，山海關方面第一路主力戰場頻頻告急，吳佩孚不得不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四時親赴前線九門口督戰，但由於海軍的不充分合作，奉軍的砲火的猛烈，飛機的擾亂，戰況非常危急；因此不得不下令張福來自北京增調援軍。

張福來一走，北京後防空虛，馮玉祥事先已與張作霖、段祺瑞、王承斌等有接洽，於是，乘機於十月

二十三日晚退出戰線，倒戈回師北京，囚禁曹錕，殺死曹的佞人李彥青；與北軍警備副司令孫岳，陝軍第一師長胡景翼，組成國民軍，聯名通電；主張停戰；並脅迫曹錕下令：前線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十一月三日，曹錕再被迫通電辭去總統職務。

吳佩孚變生肘腋，腹背受敵，乃自率部份殘部，退保天津，原希望華中各省直軍赴援。可是，一方面孫岳部步步進逼，同時山東也宣布中立，毀壞津浦鐵路；不但增援無望，連撤兵南下皆成問題。不得已乃率其勁卒萬餘人由塘沽登輪浮海南下，命令不及撤退的直軍，聽候段祺瑞派員接收；而對奉張和馮玉祥，始終不屈。

曹錕下臺後，北方不再有總統，而由奉張和馮玉祥合作，捧出段祺瑞來爲執政。可是，段已非當年皖系當政的氣勢，樣樣受制於人。逐漸的，北方又成爲奉系與國民軍爭執的局面。暗通奉軍的直系健將王承斌，却被李景林強制接收其基本嫡軍廿三師，而逃入租界，通電辭職，從此不振。

敗而復出聯奉討馮

吳佩孚乘輪南下，進入長江，在南京靠岸。齊燮元、陳調元及各省代表多人，登輪相見；當於十月十五日在輪上舉行會議，檢討敗局，計劃未來。決議以齊燮元領銜，聯合黃河上游及長江各省與直系有關的督軍，通電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遙奉曹錕爲大總統，宣告馮玉祥叛變後北京所發電令一概無效。

十七日，吳抵達漢口，以爲蕭耀南原係自己部將，一手提拔；到漢口等於已回到自己的家。於是立即發表在南京會議由齊燮元領銜的通電（上刊蕭名）。可是，此時蕭已遷就事實，違背道義；不但立即通電否認湖北擁戴「護憲軍政府」之事，而且還拒絕四川、湖南赴援吳佩孚的部隊過境。江蘇齊燮元也改變態度，否認「護憲軍政府」之事，而主張組織「聯省海陸軍訓練總司令部」，擁吳佩孚爲總司令。吳一怒之下，立即返回洛陽。於五天之內，組成「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

然而，他的敵人却放不過他，唆使過去效忠他的陝西督軍劉鎮華與他爲難，由師長憨玉琨出面，限吳於廿四小時內離開洛陽。吳倉卒之間，無兵可用，祇好離開洛陽經鄭州南下，原想往武漢暫避。但沿途迭接蕭耀南來電，請其萬勿來鄂，以免北軍藉口入侵，吳無奈，祇好在河南、湖北交界的鷄公山停留，借住他部下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鵬的別墅。

當時，段祺瑞仍發出電令：「逮捕吳佩孚解京治罪」。不久，胡景翼的國民第三軍又攻向鷄公山。吳祇好再走。恰巧，湖南的趙恆惕、四川的楊森懷念舊誼，派來專使迎吳入湘，入川暫住。於是，吳決定入湘暫住，雖說蕭耀南仍然百般阻撓，不允吳假道；但終於在川湘代表的仗義交涉和蕭部師長寇英傑的盡力維護下；吳率領衛隊二千人，安抵岳陽。

段祺瑞一方面對吳佩孚斬盡殺絕，同時喊出「東南和平」的口號，安撫有實力的直系將領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但是，奉張爲了替盧永祥收復浙江，特派大軍南下，陷南京，佔上海，逐走齊燮元。奉

軍佔有江蘇、安徽、山東、直隸四省。皖奉合作，直系惴惴自危；江西、湖北且成爲前哨陣地。於是，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在吳的聯絡支持之下，提倡「四省聯防，保境安民」。

孫傳芳因爲失去上海，盧永祥又回來爭浙江；當然不甘雌服，乃於十月十五日宣佈組成蘇、浙、贛、閩、皖五省聯軍，散佈於蘇皖境內的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等直軍，紛起響應。一戰成功，奉軍於八日之內，退出江蘇、安徽。孫傳芳開府南京，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推戴吳佩孚爲盟主。

吳佩孚乃於民國十四年十月九日通電出山，「救國鋤奸」，廿一日抵漢口，蕭耀南前倨後恭，親率文武恭迎。當成立「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於漢口東北的查家墩。網羅名士多人爲其幕僚，如參謀長蔣百里、秘書長張其鏗、總參議章炳麟、外交處長張志譚、交通處長高恩洪、政務處長白堅武、高級參謀張方巖、秘書幫辦楊雲史，都是一時名流。廿四日，吳通電討奉，當時，有十四個省份的非奉系將領，一致表示願聽候驅策。於是，吳成爲反奉的總盟主。

段祺瑞正擬要求張作霖和馮玉祥出兵，對付孫傳芳、吳佩孚。可是，馮玉祥却勾結奉系的郭松齡，通電倒張。郭的奉軍，且已進攻到距瀋陽僅六十華里之處；張幸能得到日軍的協助（干涉郭軍行動），才擊敗郭松齡，平定叛亂。

張作霖經此變故，恨馮玉祥入骨，於是，再和死敵吳佩孚言和，共同討馮。馮受奉張壓力，又想聯吳制奉。可是，吳佩孚已看慣自己部屬朝秦暮楚的嘴臉，飽受刺激；想起馮的抽腿倒戈，使自己慘敗的仇恨

，決定改變主意，於民國十四年年底，通電結束討奉戰爭。次日，馮玉祥通電下野，請段祺瑞與吳佩孚共謀國是。

吳的政見，仍爲法統問題，根本否認段祺瑞的執政元首地位。於是，元月七日，召集國會議員在漢口集會，發表宣言，主張段應下野，恢復舊國會，選舉新總統。九日，段辭職，接着張作霖坦誠致電吳佩孚，關內之事，聽吳主張；對法統問題，毫無意見。於是，吳又成爲控制北方局勢的要角。

可是，馮玉祥雖說表面上宣告下野，但其國民軍，仍駐留河北、河南、察、綏一帶。於是，一場直奉聯軍討馮的戰爭，又在北寧、津浦、平漢三鐵路線進行。馮軍再請段祺瑞回來，勉力撐拒。吳軍乘勢收復河南，直上保定。

湖北方面，督軍蕭耀南病故，吳改派廿五師師長陳嘉謨繼任，直接掌權。湖南方面，趙恒惕受到唐生智覬覦權位的影響，不願同室操戈，湘民塗炭；乃根據省憲規定任期，於二月廿四日提先離職赴滬。唐生智與兵壓迫湘軍第三師長葉開鑫退出岳州。葉向吳求援。吳派第一混成旅孫建業部，會同葉開鑫及其他反唐的湘軍，克岳州，下長沙；將唐生智擊退衡州。吳乃任命葉開鑫爲湖南省長兼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將湖南收入掌握。同時，又派兵協助孫傳芳驅逐江西督軍方本仁，任命鄧如琢爲贛軍總司令。

北方的國民軍受到奉、吳聯軍的壓力，退守京畿，馮玉祥爲了保全實力，自己出國赴俄求援，將部隊交張之江、李鳴鐘代管；立即向吳佩孚巧施苦肉計，聲明「投吳驅奉」，想藉吳佩孚的聲望和實力，抵銷

奉軍的壓力。可是，吳不上當；他在「人無信不立」的意趣下，先與奉軍會商，決定：「務必將國民軍徹底消滅」！國民軍一面以「密謀通奉」的理由，派兵包圍執政府宣佈段祺瑞三大罪狀；段被迫逃入東交民巷，托庇洋人。一面恢復曹錕自由，央求曹錕電吳進京主持大計。吳仍不允。

奉吳合作，在張作霖的一再對吳謙讓之下，二人在北京見面，居然化除成見而結為金蘭兄弟；並且付予關內討馮軍事的全權，所有直、奉、直魯聯軍（張宗昌、褚玉璞軍）、晉軍，均接受吳指揮。

當時的吳佩孚，北自南口前線，中經直隸、河南、湖北、南迄長沙，均在其控制之下；其他東南五省、四川、貴州，都表示擁戴他；真是他一生事業的「夕陽無限好」的時期。

可是，正當他北戰場順遂勝利之時；南戰場却因為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一敗塗地；而促使他走向一蹶不振、徹底失敗的命運。

落難入川淡泊自甘

唐生智自退守衡州後，即請求加入國民黨，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

民國十五年六月六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初期作戰方針為：「打倒吳佩孚」、「暫棄孫傳芳」、「不理張作霖」。即以唐生智為湖南一路的前敵總指揮，統轄其本部第八軍、李宗仁的第七軍和第四軍的一部，十日開始進攻，迅即擊破北軍在湘部隊，下湘潭、克長沙

；葉開鑫被驅退岳州，向吳佩孚告急。吳立派援湘總司令李倬章，調集鄂湘北軍約十萬人，在汨羅江北列陣，嚴陣以待。八月十五日，國民革命軍再興攻勢，激戰四日，克平江，出通城、蒲圻，斷敵歸路，已進入湖北境內，北軍大敗。

由於李倬章的一再告急，吳佩孚親率勇將劉玉春及部份雄師，南下汀泗橋，與國民革命軍決戰。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也親臨前線督攻，自八月廿三日至卅日，反覆搏殺，數度得失易手。最後國民革命軍終能以卓越的戰術、旺盛的士氣，以少擊衆，大敗北軍，力克汀泗橋。吳佩孚曾手刃撤退的官兵多人，也無法挽回潰敗的頹勢，而退守武昌。

國民革命軍繼續猛進，用迂迴戰術，渡江攻克漢陽，吳軍劉佐龍部反正投誠，靳雲鶚師也生異志，不聽吳指揮。於是吳一退孝感，再退武勝關，部衆不堪再戰，個人威望全失。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後，東向南昌，進攻孫傳芳，吳才得暫時喘息機會。

雖說，吳在鄭州、洛陽，仍想重整旗鼓，反攻武漢。然而軍費無着，兵將不前；新結金蘭共同討馮的張作霖，竟然下令阻止吳軍渡過黃河，擺出不再合作姿態，張宗昌之流願意出兵援助，也都各具用心。同時他已感覺到大勢所趨，國民革命軍一定成功，抗爭無用。於是，他對各方的自請相助，婉言謝絕；對過去受他運用的楊森、王天培、賀耀祖等投誠革命軍，也不加指責。祇是偏處洛陽，靜觀時局。民國十六年二月八日，張作霖電責他觀望誤事，請他讓路，由奉軍南下與革命軍決戰。他立即回電，阻止奉軍南下，

可是，當他五十四歲生日的當天，奉軍竟然渡河南下攻吳。他祇好再度離開洛陽，向南陽前進，準備避往第九軍于學忠的防地。然而，風聲傳播，于已有投奉之說。

因此，當他路過嵩山之時，突然表示看破紅塵，想出家爲僧。經過他的夫人（再娶的張夫人）力勸，才打消此意。

到南陽，雖說于學忠仍按常禮親率六名師長來迎，但並無竭誠擁戴，挽留暫住的意態。當時，誠所謂「天涯茫茫、走投無路」。最後還是他自己拿定主意，入川找楊森。

這是一項大冒險，楊森已投効革命軍爲第廿軍軍長，立有戰功；如果捉他獻功，豈非自投羅網？但是吳佩孚深知楊的爲人和彼此的友誼，決無問題。同時，除此以外，也真的無路可走、無人可投了。

他匆忙離開是非之地的南陽，從小路西行，指望通過他的老部下襄陽鎮守使張聯陞的防區。因爲張已投馮玉祥，接受其卅八路總司令番號，所以吳特地派人去向張交涉，請其顧念舊誼，讓他假道渡過襄河，前往四川。

張聯陞假意應允，但等到吳率隨從人員與衛隊渡河時，張却在襄河設伏，邀擊中流，幾乎要了吳的性命。

吳在王家集突圍後，在張的防區祇好專挑人跡罕見的山路行走，經歇馬河、馬良坪，抵達興山。這一路，是出了名的土匪出沒之處。吳佩孚當然不願與土匪作戰硬闖關，祇好依照江湖規矩，沿途派人手持吳

佩孚的大紅名帖，行客拜坐客。沒想到盜亦有道，不肯乘人之危；同時仰贊吳的盛名，又聽說他是入川投楊森作客的；於是不但不搶劫爲難，反而派人帶路，供給糧食，請入山寨，小作停留。

到興山，才由張方巖打電報給楊森，請其「念在舊日友誼，當此生死關頭，慨然加以援手。」

楊森是一向顧全友道的血性男兒，一面迎吳入川，先往白帝城，再往萬縣；一面電報蔣總司令，准他加以接待。吳也發出通電，聲明他來川祇是遊歷性質，決不過問政事。

吳佩孚在四川過了五年閒散生活，詩酒自娛，接受過川軍各大將領的招待與饋贈，不再過問軍政。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國民政府蔣主席曾派杜錫珪率軍艦二艘，駛抵宜昌，迎吳晉京，擬聘爲高等顧問。吳欣然應命起程，但却被扼守萬縣的劉湘部師長王陵基橫加阻撓，不許過境。吳祇好折回綏定，既未對王計較，也未向蔣主席申訴。

他在四川五年，在白帝城、萬縣、廣安、大竹、綏定等地居住，出版其詩集、蓬萊講話錄，和循分新書等著述，從他的一首「萬縣西山放歌」的詩句中，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境：

「馬革餘生何所有？匹馬南來一杯酒，了此殘年福已奇，終覺蒼蒼待吾厚……往事不堪重提起，魂魄收入詩囊裏，世外有世天外天，從前種種昨日死……一樣仰天起高歌，心膽驚時昔枕戈，此後安閒解拘縛，夢裏無復呼渡河……他年容我一杯土，不須伐石姓名敘，自古賢豪幾墳塋，茫茫烟蔓尋何所？……」

民國廿年九月，他離開四川赴蘭州，筵席之間，解決了甘肅回漢的嚴重衝突；他勸諭馮玉祥的部將雷中田，釋放回籍的甘肅省主席馬鴻賓，勉勵他們團結一致，服從中央領導。隨即經寧夏、綏遠、山西三省，回北平長住。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卵翼溥儀，成立「滿州國」，作為正式侵吞的過渡。吳佩孚激於義憤，不甘緘默，特於民國廿一年三月十日，發表通電，予以申討，所謂：

「：樹置清室廢帝，偽稱滿州獨立國，實為日本之附庸，陽辭佔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滿州遺族，早在中華範圍之中，乃忽恍於誇言，為敵人所擁立，此與身為戎首，據地外叛者，初無殊異：亟應同仇敵愾，大張撻伐，對日本則為禦侮之師，對竊據獨立者，則申討逆之義：」

真是義正辭嚴。等到國聯調查團往東北調查之先，路經北平，籍隸英國的團長萊頓爵士曾在中國代表顧維鈞陪同下，拜會吳佩孚。吳再作「致國聯調查團書」，極力主張遵守九國公約，確保中國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

當時，國事蜩蟻，情勢險惡，已經息影的軍政大員大多以為事不關己而三緘金口。吳佩孚仍能不忘國民天職，仗義直言，實屬難能，而且也足見其風骨嶙峋。

堅守晚節光榮死所

抗日戰爭既起，平津迅告淪陷，日軍找出一批漢奸，組織偽政權，原係一時權宜之計。等到民國廿七年以後，戰爭已成爲長期性質；於是日本人策訂「以華制華」策略，準備設法扶持一二素著聲威，極具份量的失意軍事領袖或者黨政要人，組織偽政權。與重慶的中央政府對立對抗，自相殘殺，牠收漁人之利。

黨政人物，因爲汪精衛先已與他們有勾結，所以他們以汪爲對象；軍事領袖，以吳佩孚爲對象。日人慫恿吳佩孚「出山」，最初以爲吳已失勢多年，現在許以權位，動以利害，必然一拍即合。不料吳却提出嚴厲的反要求，要求日軍先退出中國與東北。日人仍不甘心，特務巨頭土肥原，還有已任偽職的齊燮元經常到吳的住處什錦花園糾纏，甚至派兵監視（名爲保護），使吳非常困擾。

中央知道吳的處境，特派吳的老部下政務處長劉泗英，攜帶孔祥熙的親筆函，由重慶間關北上，于民國廿八年元月到達北平，與吳相見。孔的書信情詞懇摯，既關心他的處境，又敬佩他的愛國不撓的精神，並請他多賜救國大計。吳看信後，很欣慰。劉再補充說明中央抗戰到底的決心和誘敵深入的戰略，以及汪精衛出走的內幕。（當時陷區謠傳汪之出走主和，係和中央唱雙簧）吳聽了很感動，當即親復孔一函云：

「庸之仁兄惠鑒：泗英間關萬里齋到手書，面述尊旨，慰甚。惟剛柔相濟，古有明訓；似相反而實相成。我兄公忠體國，計當出此。弟處境安如泰山，應付綽有餘裕，請釋遠慮，一切詳情，統由泗英面達，此頌籌安，弟吳佩孚手啓，一月十日」

書信寫好，再請劉同重慶後向蔣委員長轉陳三事：修明內政，運用外交，嚴防共黨。隨即賦詩一首，以發舒他對蔣委員長的仰望，詩云：

「颯颯西風裏，秋聲動地哀；

斯民何所恃，端仗大英才」。

土肥原想逼迫吳佩孚出山落水，不擇手段，既偽造吳主張和平的通電於先，復安排一個記者招待會，于民國廿八年元月卅日在吳宅舉行，原想利用翻譯人員「假傳聖旨」的歪曲吳的論點，和他們事先準備好散發記者的書面稿件，兩相印證；使吳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之下，俯首就範；同時也可收動搖我民心士氣的心戰效果。

可是，吳胸有成竹的沉着應付，當着中外記者一百卅人，簡單明瞭的說出他的和平先決三條件：

1. 日本無條件全面撤兵。

2. 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3. 日本應以刻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

話頭一落，立即叫他的叢秘書大聲譯成外文，無形中否認日人事先為他準備好的書面談話，並且致贈各記者「大丈夫論」一冊，闡明立場。結果，真相大白，謠言平息；土肥原白忙一頓，枉費心機。

汪精衛出走以後，與日人勾結，由於他和日人簽訂的賣國密約被人揭露，而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漢奸。

，聲望一落千丈，號召力減低，無法達成日人「以華制華」的目標。於是日人慫恿由汪出面拉攏吳佩孚合作，汪乃于五月廿二日，致函吳佩孚，暢論國事，探吳意向；以爲「非恢復和平，無以內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主張「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

吳佩孚接到汪的函件，立即批復：「公離重慶，失所瞻依，如虎出山入柙，無謀和之價值，果能再回重慶，通電往來可也。」

汪精衛仍不死心，六月廿六日，親往北平，要與吳面談。吳却以難找適合會面地點爲藉口，讓汪等了半個月，仍然無法見面。汪敗興而返，再派他的親信陳中孚幾次北上，竭盡所能的和吳見面；傳達汪的合作請求，許以偽國民政府的「軍委會委員長」兼「北平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的偽職。吳佩孚除了當場痛斥汪精衛下賤外，並托陳轉送汪一本文天祥的「正氣歌」，用以懲戒汪的變節無耻。

由汪精衛出面邀約吳佩孚合作失敗了，日本人又直接出面接棒交涉。最後，由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親自出馬訪吳，表示日軍決定劃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河北六省之地，交吳主持一切；稱謂名義，概由吳自行定奪，並且希望吳于民國廿九年元旦宣言就職。

日軍此一謀略，是想以六省地盤權利爲釣餌，利用吳佩孚與中央自相殘殺，緩衝國軍的反攻行動；他們好加強對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的切實控制。吳佩孚當然不肯改變初衷的去上當，可是，他也知道，日人如此一再逼迫，自己一再峻拒，終有最後攤牌的時期。因此，他與幕僚判斷中國終必得到最後

勝利，但他自己：「無論如何看不見了。」於是，預先留下他準備殉國的「春感九首」絕筆詩。第八首是對蔣委員長的敬佩與寄望，詩云：

欲將詩酒遣良時，遙望南天淚已垂；

一語寄君應努力，滿盤棋局仗誰支？

第九首則自明忠貞不屈的心跡，詩云：

避秦舊地莫重論，渡口雲迷古洞門，

十里桃花紅似昔，還從方寸覓仙源。

日人因為逼誘吳佩孚出組偽府一再失敗，最後乘吳患牙痛小病之機，托言拔牙，于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四日，由日人川本大作少將、大漢奸齊燮元、符定一等闖入吳宅；日醫石田動手行凶，一刀戳穿吳佩孚的喉管，吳遂殉國。國民政府蔣主席在重慶聞此惡耗，特拍唁電讚吳：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羣奸竭其簧鼓，迄復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蒙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

吳佩孚的家屬奉到蔣委員長的唁電，第一反應，即為峻拒漢奸政府的兩萬元治喪費；並且設法通過英

國的路透社，于十二月十四日，從上海發出專電，報導死難經過。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于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九日，特發褒揚令，追贈陸軍一級上將。令文云：

「故陸軍上將吳佩孚，秉性剛直，志行堅貞，曩年整軍經武，卓著聲稱，而其嫉惡黜邪，持正不阿，尤有裨於世道人心。瀋陽變起，櫻懷國難，恆以精忠自勵，燕京被陷，處境益艱，敵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脅利誘，層出不窮，猶能勉全所守，終始弗渝。凜然爲國家民族增重，英風亮節，中外同欽。方冀克享遐齡，長資矜式。廼以微疾溘逝，緬懷忠義，痛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特給治喪費一萬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軫念賢良，激勵忠貞之至意，此令」

抗戰勝利後，民國卅五年二月十六日，國民政府明令公葬吳佩孚於北平玉泉山。

英風傲骨正氣流芳

綜觀吳佩孚的一生，確是中華民國卅年代以前的不凡凡人物。

他雖然沒有進過正規的軍事大學，接受過高級軍事教育；但從他歷次戰役所表現的指揮統御才能，從他訓練士卒的著有成效，不愧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

曾經在德國學習軍事的段祺瑞，是他的敵人，性情剛強好勝，從不擊節讚人；但却對吳佩孚的軍事才

能，不惜一再的公開表示：

「吳子玉作戰很有能耐，不管什麼隊伍，由他指揮，就很可能打仗！」

當王占元北上天津開會後返回湖北，途經鄭州，看到在車站列隊歡迎他的第三師學兵隊，雄糾糾、氣昂昂，雖逢傾盆大雨，仍然整齊嚴肅，面不改色；不覺大為感動，曾經公開表示：

「吳子玉訓練的軍隊，才是軍隊；咱們是什麼軍隊？」

然而，吳佩孚却不是卓越的政治家。他祇知道忠心上，從一而終；一心一德效忠曹錕，效忠北洋，而未能適應潮流，明辨順逆；把握時機，獨樹一幟，為達成自己的理想抱負，獨立奮鬥，自創事業。以致受制於曹錕的庸俗貪枉，張作霖的驕橫勢利。不但平常他所主張的「精練士卒、統一禦侮、清心寡慾、四維八德」，成為曲高和寡的論調；就是他在幾次獲得重大戰役勝利後的政治主張，也因為未能獲得曹錕和張作霖的竭誠支持而虎頭蛇尾，為一般貪鄙的軍人和狡詐陰險的政客所抵制所消除。

比如直皖之戰勝利後，他曾提出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是的主張；立即遭受張作霖的反對，不惜針鋒相對的發表通電，強詞駁斥。當他要求解散安福系操縱的新國會，立即遭受徐世昌的反對，即為顯例。

直奉第一次戰勝，他的聲望更高，發言的份量更重。在他極力主張之下，總算達成他恢復約法的目標，迫使由安福國會選出的徐世昌總統辭職，而迎接息影天津的原任總統黎元洪復職，維繫法統，並希望由此促成全國統一。可是，當他進一步主張：「廢督裁兵，組織超然內閣，召開國會制定憲法，劃分租稅，

國稅概歸中央，軍隊歸於國家，軍餉由中央發放」等改革措施時，即遭受各方阻力，而無法實施。結果，不但他自己幾次牽涉到內閣風波之中；甚至被嫉恨者所譏諷，竟然無法勸阻曹錕逼宮賄選，王承斌扣車奪印的醜劇。

政治家需要有令人欣服的器度，寬容的雅量 and 令人感懷的德政，才能可大可久的創事業、立功勳。吳佩孚對部屬的任使升黜，往往臨以軍威，誘以利害；而不從仁德道義上多着力。以致其部屬中的巧詭者，嗜利重於守義，對吳畏威而不懷德。試觀當吳由盛而衰之時，往往有部屬叛變、離德與離心之事。如直奉二次之敗，導因於馮玉祥的倒戈政變；吳浮海南下，籌組「護憲軍政府」，希望團結直系殘餘力量，與奉系相持到底時，蕭耀南、齊燮元輩的冷淡掣肘，憨玉琨的乘人之危，犯上驅吳；以及革命軍起，吳退守武漢時，劉佐龍、靳雲鶚的叛離等，都是顯例。因而使吳未能在曹錕被囚後，成為真正接棒的直系領袖。有曹錕在，成為他的包袱，處處受曹牽制；但沒有曹，又像是缺少什麼，使直系無法鞏固團結，這是吳佩孚的悲哀。

吳有耿介剛直，嫉惡如仇的性格，當其全盛之時，對過訪的政客人士和自己的部屬，往往不假辭色，盛氣凌人，顯得不够雍容寬和。當直奉二次戰敗，吳在浮海南下的華甲輪上，召集幕僚檢討得失時，張其煌就曾勸他今後不但要「改變武力統一的標榜」，而且要「寬待政客要人，苟有主張之士，雖政敵亦敬重之，尤不可斥罵」，「遠倭近賢，多用新人才」。

凡此種種，都說明吳佩孚雖然有些傾動天下的政治主張，但他未能成為扭轉乾坤、創造時勢的政治家，而擺脫不掉軍閥的範疇。

可是，「時窮節乃現」，他那風骨嶙峋的品格、光明磊落的態度和堅亮正直的氣節，却在他失敗以後，顯耀其光輝。

當直奉二次戰敗，他退守天津時，日本領事吉田茂，找到他的日籍顧問岡野增次郎，告知他有關「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合兵進逼天津，以及張作霖要取他腦袋」的消息，並且建議他暫退日本租界。他祇禮貌上感激吉田茂的好意，但立即嚴正的表示：

「誰要我進租界，我要誰的腦袋。」

當他被國民軍追逐，由鷄公山避往漢口時，蕭耀南居然避而不見，派出人馬，請他住法租界，發表聲明，從此不過問政治，衛隊繳械。當時情勢危急，咄咄逼人；張夫人想一權宜之計，向他建議：「堅持不入租界，但找一前門是華界後門是租界的房子住下；其餘條件照辦。」他斷然表示：「我部下不能繳我衛隊的械，我決不入租界，不論我過不過問政治，不用為誰發通電」，不屈不撓。

當他自武漢失敗，避居四川，在楊森防地作客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曾專程自宜昌入川拜訪；表示日軍願協助他東山再起，先貸予私人借款一百萬元，奉送步槍十萬枝、山砲五百門、機關槍二千挺，連同彈藥，運入四川。他慨然婉拒說：「天下事的成敗

利鈍，並不在若干枝槍，多少金錢。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了斷；外人盛意，敬謝不敏。」

他自民國十六年入川，一直到民國廿年離川赴西北，四年之中，從不曾開口或命人向楊森要一文錢，要一件東西；楊森始終注意他的實際需要，適時補給，不虞匱乏。「君子之交淡如水」，曾經叱咤風雲的吳大帥，這種徹底放下一切的風範，從他於民國廿一年元月廿一日，回到北平所作的對聯，可見一般：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他的不積金錢，並非徒唱高調。民國廿七年，他曾經親口向他的秘書楊雲史談他的家務：

「早先家裏有幾畝薄田，現在中央又補助三千元，可以過得去了；這年頭，過得去已經是福氣了。」
比起當年一般北洋軍政要員，私產動輒百萬；身為大帥的他，可謂鶴立雞羣、光霽日月了。所遺憾的他伯道無兒，以他三弟文孚的兒子道時兼祧二房。

他失敗後的倔強到底，最難得的是維持正氣，不爲勢刼，不爲利誘。當他被敵人謀害，成仁殉國後，楊雲史曾哭以律詩，悼念他的一生，極爲悲壯確切：

「……談笑揮強敵，將軍繞指鋼，自全惟氣節，無欲便堅剛。虎口定三戒，人心持一匡，蓋棺今定論，輿觀太心傷。」

由秀才從軍而統兵百萬。而虎踞中州，關係大局；而失敗入川，飽嘗世態；而視死如歸，全節流芳。吳佩孚的一生，開合起落，波濤壯闊。最難得的，由於長期抗戰，給他一個成仁殉國大好時機和最佳死所。使他平生的志事風骨，有一個塑造典型的好收場。

可是，同一時機，汪精衛却不能保全晚節，而去叛國投敵，結果身死敵國，遺臭萬年。一念之差，生死榮枯，迥然不同。豈不令人不勝感嘆？豈不令人憬然戒懼？

